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二七四）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四〇期 ——
（二〇〇五年六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06e）

【往事追忆】我的“文革”岁月	爱泼斯坦
【文献资料】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里程碑——热烈欢呼中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来的伟大胜利	爱泼斯坦
【旧文重登】《人民日报》关于莫斯科电影节的两则报道	
【各抒己见】文革暴力探源——看电影《十七岁自行车》有感 （附网友评论、讨论）	时东陆
【难忘岁月】《风雨人生路》摘载（之四）	刘文忠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往事追忆】

我的“文革”岁月

• 爱泼斯坦 •

〔编者注：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1915年4月20日生于波兰犹太家庭。1917年随父母移居中国。1931年在《京津泰晤士报》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37年起任美国合众社记者。1951年应宋庆龄之邀，回中国参与《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工作。1957年加入中国籍。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今日中国》名誉总编辑等职。今年5月26日去世。〕

我很晚才听说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消息。1966年夏天，我带着孩子们去北戴河休假。妻子邱茉莉回英国探亲去了。她在给我的一封信里问我是不是知道学生“红卫兵”已经在北京上街了，她是从外国通讯社的电讯中看到这一消息的。从那边报上登载的报道，她好像感到困惑，也有点紧张。我复信安慰她说，西方记者报道“红色中国”的任何事情总会加以渲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生的年轻人继续革命，一定会是健全的，即使在开始时有点越轨行动（在群

众运动中这是难免的)，以后是会纠正的。我这样说，是想对现实情况作点理性的分析。

对于中国的政治运动（它们常常是突如其来的）我已司空见惯，但没有料到这一次的来势如此凶猛，真是史无前例，更没有想到运动的发展如此高潮迭起、路径曲折，以至于最后完全失去了控制。（难道有人能预见及此吗？）运动所要打倒的不但是旧社会的上层分子，还有那些在摧毁旧社会的斗争中的领导者和支持者，“红卫兵”要求所有这些人“举手投降”并且写“认罪书”。共产党各级干部中的绝大多数都成了挨整的对象。对于30岁以上的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时在13岁以上），运动特别要求他们把过去文化教育中所学到的或可能学到的东西全部清除干净。马克思——还有毛泽东——曾说过，应该批判地吸收过去的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但“文化大革命”却要否定一切。

我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当历史的火车头急转弯时”（用列宁的话说），不要让自己从革命的列车上掉下来；也不要像毛泽东所用的中国式比喻中所说，像一个小脚老太太走路，远远落在英勇先锋的后面。“与革命同步”是我从少年时代以来所作的选择。我决心不落后、不泄气、不要被淘汰。

在这方面，美国友人寒春和她的丈夫阳早所写的一张大字报对我起了示范的作用。他们这张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

呼吁有关领导接纳具有革命思想的在华外籍工作人员参加这场运动（世界革命实践中的新发展）；

对这些外籍人员不要像资产阶级专家那样对待，而要像阶级兄弟那样对待……允许和鼓励他们参加体力劳动……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接触工人和农民！

对这些外籍人员的“子女应该同对中国孩子一样，提出严格的要求”；

对这些外籍人员不应再给以“特殊待遇”。同中国普通人相比，他们享受着“超高级的生活水准”，这会“使那些要求成为革命者的外国人难以掌握毛泽东思想，腐蚀在华的外国革命者，阻碍他们的子女走上革命道路，并使外籍工作人员脱离中国的阶级弟兄，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我是公开积极响应这张大字报的第一个“外国专家”，后来别人也纷纷响应。1966年9月8日毛泽东主席作了如下批示，交给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等人：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志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为了传达和执行这一批示，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把寒春、阳早和我们几个最早的支持者找去谈话。他强调参加运动必须是完全自愿的，不要施加压力。

于是我们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类型的外国人（包括已入中国籍者）组织，取名为“毛泽东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白求恩”象征献身于世界革命的精神，如同这位著名的加拿大医生一样，他在1936—1939年西班牙反法西斯内战中曾参加“国际纵队”，后来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为敌后游击队治疗伤员而病逝，毛泽东赞扬他是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楷模。“延安”象征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造反”是红卫兵组织名称中常用的词，来自毛的语录“造反有理”，意思是说，反对修正主义、官僚主义和其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苏联当时被指责为正

在使资本主义复辟）——这样的“造反”是正确的。

在北京的外籍工作人员大约超过半数都参加了我们这个造反团，分别隶属于所在工作单位的分支组织。同所有“红卫兵”一样，我们穿着蓝色或灰色的棉布制服，带上红袖章，到处开会（我们自己的会以及其他造反派的会，邀请我们去参加或讲话，后者越来越多）。我几乎是每请必到，我把所有中国人的“红卫兵”组织都看成是革命的，不管它们彼此之间怎样看待对方。

我无意在这里回溯或试图逐年细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许多人已经这样做了，将来还会有人继续做），我只想记述最初两年中我努力参加运动的主要经历。

在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所有“红卫兵”组织都一样是革命的、动机纯正的，有点派性是次要的。很多“红卫兵”组织请我去参加他们的集会或在会上讲话，希望借此显示（至少象征性地，因为我有一张外国人的脸）国际上同情中国这场革命的。对于这样的邀请，绝大多数我都是接受的，在首都北京我至少作过 20 次演讲。在教育界，我出现过的地方有北京大学和一些专业性学院如钢铁学院、外贸学院、体育学院等，以及部队的全国性学院如后勤学院、无线电通讯学校等，还有一些中学。除学生“红卫兵”以外，还有外交部、第一机械工业部、中国人民银行、进出口公司及其他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的“造反派”组织。我还在北京的一些时事性户外大规模集会上以及天津（我青少年时代的家乡）南开大学的一次全市大会上发表过讲话。

这些活动都不是由机关单位或学校出面组织，而是由相互敌对的“红卫兵”组织举办的。我对这类邀请的态度一般是“先来先应”。我记得只有一次我拒绝了——有一群“红卫兵”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邀我同去。在游行和集会中，我是跟着大家高喊反对他（和邓小平）的口号的，但我觉得不应该用群众行动的方式去揪他。因为对于“揪刘”我有这样的保留意见，来邀请我的“红卫兵”威胁说要揪斗我。在我的工作单位（中国外文出版局和《中国建设》杂志社）也有几个“红卫兵”组织，我（和邱茉莉）属于其中一个。当时北京的“红卫兵”主要分成两大派，各单位内部相互敌对的“红卫兵”组织分别归属或倾向于其中的一派。有时外单位的“红卫兵”组织通过我单位同一派的“红卫兵”组织来邀请我去开会或讲话，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显示出了一点“派性”，此外我对所有“红卫兵”都是一视同仁的。

不久，所有外国人都不得不同“文化大革命”沾边，有少数人——包括我和邱茉莉——被捕。我的罪名有两条，一条是伙同他人，阴谋篡夺对外宣传的领导权，另一条是充当国际间谍。邱茉莉也被怀疑是国际间谍。但对我们始终没有正式的起诉，也没有正式的审讯。

□ 摘自《爱泼斯坦回忆录——见证中国》
~~~~~

**【文献资料】**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里程碑  
——热烈欢呼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来的伟大胜利

• 爱泼斯坦 •

（一）

一九四四年秋，我参加一个外国记者团，在晋西北敌后同八路军一起生活了几个星期。在一次夜行军中，我们随一个连队走到一个村口。一个放哨的民兵拦住了队伍，进行盘问。我们这些记者很为这个场面所感动。这里只有他一个人，但他无所畏惧地挡住了这支相当大的带枪

的队伍，如果查明是自己的军队，他就发出讯号，让村里老乡来迎接和安顿来人；如果发现前来的是敌人，他就向民兵和村里居民发出战斗警报。

但是更感动我们的还是这个哨兵的谈话。我们乘这短暂的停留时间同他简单地交谈。一个记者问他：“把日本人赶跑之后，你是不是想放下这个不脱产民兵的任务，回去全副精力种田？”他答道：“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们的斗争还没有完。打走了日本，我们还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以后还要搞社会主义，然后还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二十三年来，我常常想到这个民兵。他不认识字，他的武器只是一枝红缨枪。但他是一个自觉的历史创造者，因此他是不可战胜的。这位同志既有当前的纲领，又有远大的目标；他掌握了基本的理论，并且用于实践。他同时是一个战士、一个生产者，又是一个革命宣传者。自从我见了他之后，我就十分具体地认识到并且毫不怀疑地相信，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其他一切敌人。是什么力量培育出这个人 and 千千万万象他这样的人？是伟大的革命斗争，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和军队在斗争中所进行的教育的结果。

有了这样的群众，中国赢得了解放，并且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辉煌成就。

我还从晋西北这位农民民兵联想到国际形势的发展。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国家被击败之后，其他地方的革命，没有象中国革命那样继续前进取得胜利？后来，为什么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了颜色，倒退到资本主义老路上去？为什么不少的共产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失去了战斗力，并且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一种新型的变节的社会民主党？今天，我已得到了明确的答案：因为它们没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来鼓动、引导和组织浩浩荡荡的群众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来掀起强大的群众斗争的浪潮，给阶级敌人以不断的打击。

毛主席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这是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革命的根本问题。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就是唤醒他们起来战斗，使他们获得对这一任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就同晋西北这位民兵的觉悟一样。

## （二）

今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毛主席亲自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对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而且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头等重要的大事。全世界革命人民热烈欢呼一年来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彻底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大大小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成果。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问题，保证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加强，保证了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同时，这场大革命正在培育出广大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闯将——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他们是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以及为建设新的社会主义文化而进行的斗争中取得新胜利的保证。他们的出现，保证七亿人民的社会主义中国将永不变色，强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已成了世界革命的坚强堡垒。

当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丧魂落魄、狂呼乱叫的时候，全世界革命人民看到了东方升起的红太阳，照亮了他们的道路。他们热烈欢呼，准备迎接新的斗争，去争取新的

胜利。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射到全世界各个角落。毛泽东思想同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就会把世界革命从胜利推向胜利，就会使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以及各国反动派遭到粉碎性的打击，从而大大加快它们的不可避免的最后失败。

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不受地理条件限制的。遵循毛主席的思想，就会燃起革命的星星之火，并且发展成为燎原的大火。否则，革命就会被修正主义所扼杀。

### （三）

最近发表的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的历史文件。毛主席在他亲自主持制定的这个文件中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一年来，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充分证明毛主席这一科学论断是非常英明的。现在大家清楚，毛主席一年前指出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是已经被中国广大革命群众揪出来的那个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前，中国亿万革命群众，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特别是对他那本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阴险的《修养》——这本书被贩卖到全世界，取名为《怎样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进行彻底的批判。这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因为这个人当前在中国这个世界革命中心扛着修正主义和对帝国主义的投降主义破旗的旗手，他的这本书就是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的纲领。

这本书传播很广，影响很大。现在有人说，“我们没有读过这本书，也没受它的影响，所以它同我们没有关系。”是这样吗？在发展、扩大革命的理论同损害、摧残革命的理论同实践之间，必然会在世界革命运动的各个阶段发生决定性的斗争。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是发展的，它的敌人也会以新的伪装出现，因此，必须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把它击败。当马克思对那些在第一国际中反对他的空想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假社会主义者进行斗争时，有人能只是因为没读过他们的书而说“这同我没有关系”吗？这样的“中立主义者”不可避免地要脱离革命队伍。当列宁同第二国际的老修正主义者进行斗争，当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进行斗争时，情况也是一样。如果他们的斗争没有进行到最后胜利，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不会有列宁主义，不会有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政权。今天，如果不把修正主义连根挖掉，无产阶级政权即使建立了也会失掉。

在所有这些斗争中，关键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并且把一切相反的思想从当时的工人运动中肃清。马克思逝世之后，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者，一方面装作“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竭力想在工人运动中模糊和抹掉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最根本的问题。列宁揭露了他们的伪装，把无产阶级专政重新放到中心的位置，对它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不朽的、震撼世界的贡献。列宁逝世之后，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机会主义者，手里摇晃着假“列宁主义”的旗帜，力图削弱为斯大林所巩固下来的无产阶级专政。而赫鲁晓夫这个天字第一号修正主义者就在列宁缔造的苏维埃国家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把它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中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所有这些叛徒的继承人。在他这本据说是为“共产党员修养”的书中，他不但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甚至于在引用列宁著作时也把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删掉。《修养》完全背叛了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彻底背叛了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修养》的作者不是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模一样，又是什么？

同所有投降变节的修正主义者一样，《修养》的作者还想使革命力量失去他们的领袖。马克思在世时，所有修正主义者都反对他；他逝世以后，他们对他表示“忠诚”，却反对列宁。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在他这本书里要我们“向马克思和列宁学习”，却不要我们向当代的列宁——毛泽东同志学习。谈共产党人的“修养”而不把他们的活动同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战争密切联系起来，而且即使在这本书的一九六二年的新改版中，也根本不提当前反对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任务，不号召他们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这实际上是诱骗人民脱离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

全世界革命人民绝对不会接受这样的“修养”，也不会接受这样“修养”出来的自封的革命者。他们所需要的并且正在掌握的是毛泽东思想！他们需要的是由毛泽东思想赋予革命活力的党。

#### （四）

毛泽东思想把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所有革命阶段的中心任务，直到完全实现共产主义，消灭阶级为止。这是毛主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国际无产阶级的巨大贡献。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发表的《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对这一点作了十分正确的阐述。文章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和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在一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因此，遵循毛泽东思想就能保证使革命派的努力永离不开正确的目标，工人阶级和人民的胜利果实永不被人窃取，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就能取得最后胜利。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普及到广大群众之中，用来武装思想，使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在前所未有的规模上变为无比强大的物质力量。如果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复辟分子企图从上面来篡夺革命权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群众就会从下面对他们进行夺权，并且以排山倒海之势把无产阶级革命推向前进。

在热烈庆祝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来的伟大胜利的时候，让我们彻底批判中国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让我们都来批倒、批臭《修养》，因为我们批判得好、批判得深刻，就能批倒、批臭一切修正主义。

让我们在全世界树立起毛泽东思想——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反帝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向共产主义的光辉未来前进的胜利保证。

让我们热烈地欢呼：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 原载《人民日报》1967年5月22日

~~~~~

【旧文重登】

《人民日报》关于莫斯科电影节的两则报道

◇ 标题：莫斯科反革命电影黑会上群魔乱舞乌烟瘴气，苏修集团疯狂鼓吹联美反华大肆宣扬西方生活方式（1967.08.08）

（新华社莫斯科五日电）苏修集团勾结美帝国主义举行的所谓第五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近已经收场。这是苏修积极大搞联美反华，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宣扬腐朽西方生活方式，推行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电影黑会。

苏修头头柯西金亲自给“电影节”梳妆打扮。他在贺词中叫嚷电影艺术的任务在于“树立人的基于现代先进思想的世界观”，“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是现代电影艺术成就的大示威”，“有助于各国文化交流的发展”等等。

勃列日涅夫一柯西金集团所鼓吹的“现代先进思想”、“现代电影艺术成就”和“文化交流”等等究竟是什么货色呢？只要解剖一下电影节上被推崇备至并获重奖的“标本”就昭然若揭了。

这次电影节从七月五日举行到七月二十日。最后，故事片评委会把“电影节”的两个大奖（整个电影节最主要奖）给了苏联影片《记者》和匈牙利影片《父亲》。

影片《记者》是苏修电影界霸头格拉西莫夫编导和亲自参加演出的，是一部疯狂鼓吹联美反华的大毒草。影片描写一个苏联记者被派到瑞士和法国当记者时，在那里结交了一个作为美帝国主义御用工具的美国记者，此后两人称兄道弟，推心置腹，几乎是形影不离。影片通过美国记者之口竭力宣扬苏修领导集团要各国人民向帝国主义缴械投降的谬论，说什么应当把所有的武器统统扔掉以建立和平的新世界。这个美国记者的“报道”曾引起美国商人的不满，许多美国商人在酒馆中包围了这个美国佬，甚至有人要动手揍他。这时苏联记者出面解围，把美国记者从美国商人的包围中解救出来。美国记者还领着苏联记者到处闲逛，一起逛巴黎的夜总会，看“脱衣舞”直到深夜。影片长时间的渲染糜烂腐朽的巴黎夜生活，无耻之极。

更为疯狂的是，由格拉西莫夫扮演的另一个苏联老年记者，在巴黎同法国演员的对话中，竟明目张胆地咒骂中国的红卫兵。格拉西莫夫在两年前发表的这个电影脚本中还没有提到什么具体的反华词句，但现在为了适应苏修领导集团进一步疯狂反华、反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剧本中新加上了攻击中国红卫兵的一段台词。

很显然，联美反华的政治内容，就是苏修影片《记者》获得“大奖”的真正原因。

获得“大奖”的匈牙利影片《父亲》是一部疯狂反对斯大林，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毒影片。影片中别有用心地把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事件搬上了银幕，描写反革命分子如何把象征着无产阶级政权的红星砸得粉碎，“居民们”如何把斯大林的塑像毁掉等等。根据现代修正主义的政治纲领炮制出来的这部影片，是彻头彻尾为反革命张目的黑货。此外，低级下流的保加利亚影片《距离》和捷克斯洛伐克影片《小号浪漫曲》，分别获得

“特别金质奖”、“特别银质奖”歌颂投降主义的波兰影片《维斯特普雷特》获得“银质奖”。为鼓吹“苏日合作”，而由苏日合拍的《小逃亡者》获得儿童片“金质奖”。

在这次“电影节”上，苏修集团表现了一副狂热追求“美苏全面合作”的奴才相。美国应苏修集团的“邀请”，派出了好几十人乘坐专机到莫斯科参加“电影节”，这是美国从来没有派出过的庞大电影代表团。当美国第一部参加比赛的故事片在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大会堂”上映时，苏修集团特地安排了美国代表团走上舞台同观众见面，当时好几部电影机对准了这些“贵宾”，场内出现了任何一个其它国家影片上映时所不曾出现的“热烈气氛”。同一天晚上，美国电影代表团在莫斯科最新建成的最大的“俄罗斯”旅馆中举行了七百人的“盛大晚宴”，招待苏修的“文化界名流”。苏修领导集团让美国在这次“电影节”上先后放映七部美国故事片，三部儿童片和二部纪录短片，共十二部。最后，授予美国一个“最佳女演员奖”，一个儿童片“银质奖”，一个导演“荣誉奖状”。不论从苏修影片《记者》中反映出来的苏联同美国记者的关系，还是从“电影节”期间苏修对美国“贵宾”的态度，都可以看出，苏修集团已完全拜倒在美帝国主义的脚下，甘心情愿在以美帝国主义为盟主的反革命“神圣同盟”中，充当一名驯服的帮凶和奴仆。

苏修串通美帝搞的这次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是勃列日涅夫一柯西金之流叛徒面目又一次大暴露。事实非常清楚，柯西金所谓的“现代先进思想”，就是万恶的帝国主义和为它效劳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想。他所谓的“现代电影艺术成就”，就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反华、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破烂。他们所谓的“文化交流”，就是苏修、美帝及它们的走卒互相交换资产阶级反革命的黑货。苏修领导集团企图以这些最反动、最腐朽、最丑恶的东西来欺骗和愚弄苏联及世界人民，是枉费心机的。

伟大的苏联人民决不会容忍反革命修正主义长期统治下去，决不会允许一切牛鬼蛇神霸占苏联的银幕。总有一天在苏联辽阔的大地上会响起第二次十月革命的号角，会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吼声，会燃起熊熊的革命烈火，把苏修领导集团这一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彻底摧毁，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 标题：毒草丛生、群魔乱舞、苏修主办反革命‘电影节’联美媚美丑态百出，苏联人民强烈反对苏修利用电影进行反革命活动（1969.08.19）

（新华社十七日讯）莫斯科消息：苏修叛徒集团最近在莫斯科主办了一次所谓的‘国际电影节’，露骨地勾结美帝和各国反动派，利用电影进行反共反人民和反革命的罪恶活动。这是苏修叛徒集团对其‘反帝’谎言的又一次自我揭露，也是它利用形形色色的西方资产阶级腐朽透顶的黑货为其在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一次丑恶表演。

这次‘电影节’七月七日在莫斯科开场，七月二十二日收场。‘电影节’开幕后，上至苏修叛徒集团的头目，下至爵士乐队的吹打手和苏修的全部宣传机器，都纷纷出动为‘电影节’摇旗呐喊。柯西金亲自出马给‘电影节’拍电报以示‘祝贺’，并且打出了‘电影节’是‘为了电影艺术的人道主义，为了各国间的和平和友谊’的资产阶级口号。就是在这面黑旗下，一些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电影界的反动‘权威’、制片商、‘明星’等等蜂拥到莫斯科，短短半个月内容映了大量宣扬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毒草影片。苏修又是组织对这些影片的‘观摩’，又是组织‘比赛’，并巧立名目为这些影片授奖，表现出一副完全拜倒在西方帝国主义影片脚下的丑态。‘电影节’后，苏修又把大量西方影片拿到莫斯科和其他城市放映，把这些毒草广为扩散，毒害苏联人民。

与苏修这股热烈的劲头相呼应，美帝头目尼克松也向‘电影节’发了‘贺电’，还派出了一

个约五十人组成的庞大的‘电影代表团’到莫斯科。这个代表团带去了十多部吹捧尼克松和宣扬美国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影片。美国代表团的规模之大和带去影片的数量之多都占电影节的首位。

苏修叛徒集团向美国‘代表团’百般献媚，把他们安置在莫斯科最高级的饭店。苏修通过报刊卖劲地介绍美国电影明星，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引人注目的地方张贴美国影片广告，广为散发美国电影说明书，并给美国电影大发奖状。美国代表团‘神气活现’，又是开记者招待会，又是办电影晚会，四出活动，忙得团团转。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尼克松的特别顾问加门特还亲自到苏联咖啡馆参加苏联爵士乐队的演奏。加门特连连称赞苏联爵士乐队的演奏，说可以和美帝的爵士乐队‘相比美’。美国电影协会主席瓦伦蒂也在苏修报刊上大发议论，鼓吹美帝和苏修今后更多地交流影片。苏修和这些美国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打得十分火热，让他们在莫斯科出足风头。这是苏修为加紧勾结美帝不择手段地媚美联美的又一丑恶表演。

苏修拿到‘电影节’参加比赛的影片，有的通过对一个中学的三天生活的描写，赤裸裸地贩卖勃列日涅夫之流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公开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人性论；有的露骨地宣扬荒淫无耻、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等，不一而足。

苏修在‘电影节’上还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那些歌颂帝王将相、丑化劳动人民、宣扬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生活的形形色色的毒草影片推崇备至，给这些毒草影片大发奖状。

此外在‘电影节’上还放映了许多宣扬战争恐怖、贩卖活命哲学的影片。

苏修叛徒集团还无耻地把这次乌七八糟的‘电影节’同列宁诞辰一百周年扯到一起。在‘电影节’期间，他们放映了几部有关列宁的影片，歪曲列宁的伟大的光辉的形象。

苏修叛徒集团在‘电影节’上的所作所为，完完全全是对伟大列宁和苏联革命人民的污辱，进一步证明他们是彻头彻尾背叛了列宁主义的叛徒。

苏修叛徒集团主办的这次所谓‘国际电影节’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毒草影片的大杂烩，它是为苏修叛徒集团反共、反人民和反革命修正主义政治目的服务的。苏修的这次丑恶表演，遭到了苏联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抵制。当放映那些乌七八糟的影片时，苏联观众有的加以斥责，有的中途退场。

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苏联无产阶级和人民必将埋葬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和发展真正革命的电影事业。

~~~~~

## 【各抒己见】

文革暴力探源——看电影《十七岁自行车》有感  
(附网友评论、讨论)

• 时东陆 •

对于文革，无论是回忆还是分析，评论文章已经浩如烟海。许多人在寻找文革的起因，试图从政治和历史的角

中发生的暴力行为，大多文章又仅仅侧重于对其的揭露和由此产生的义愤。却很少有人去探讨暴力的本源：为什么当时的中学生如此残忍和无情？许多文章指出：中学生是受了某些人的指使和利用。由于他们的无知而成为文革的打手。红卫兵的行为完全来自于政治的误导和坏人的利用。除此之外，很少能看见另类的分析。

但是，无论在何种历史条件下，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以一种疯狂的手段摧残自己的老师，仅仅用“政治误导”来作为动机和原由，这种分析实在有些单一和肤浅。过去的文章过于强调政治和历史，却完全忽略了来自于心理和文化的因素。

笔者曾经目睹街头施暴的红卫兵们，也曾经看到过去高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如何凶恶地鞭打温文尔雅的校长。最为难以让人理解的是这些“大哥哥大姐姐”都是文革前的高才生。他们不仅才华横溢，聪明才智，而且是校内的骨干和最优秀的班干部。我曾经以十分仰慕的心情听他们傲慢地讨论天外星人，阿以恶战，二战战史，以及《金陵春梦》，《十日谈》，和《拍案惊奇》。当北京的中学生们还在玩矿石收音机的时候，他们已经会装晶体管无线电发射机了。他们曾经参加《东方红》的汇演和长安街的迎宾队。每次遇到他们，我会看到绸子做的红领巾，雪白的衬衣，微微翻动的臂章，礼貌的微笑和略微遮掩的优越感。他们是《让我们荡起双桨》歌曲真正的主人和演唱者。现在想起来，他们当时不过十四，五岁的年纪。但是就在1966年的夏天，他们温和的笑脸徒然变色，从蓝天里的天使一下子变成狰狞的群魔，在铁与血的恐怖中走向歇斯底里。

在四十年之后，我好像淡忘了1966年在北京街头发生的暴行。我却在《十七岁自行车》电影中忽然回到文革的岁月。《十七岁自行车》其实是当代的故事。电影里的中学生已经是身着校服，耳听摇滚，波普时尚，网络意识的前卫少年了。但是他们在殴打那位农村青年时的神情和残忍几乎与文革中的红卫兵如出一辙。尤其在影片后半部众人在围堵主角和农村青年的时候对他们凶残地殴打已经十分的显出手心理病态的迹象。最后，那位同学，几乎是无法停顿地，歇斯底里的摧毁那辆农村青年心爱的自行车。他又踢又摔，面无表情，一下，两下，三下。。。车子已经彻底损坏了，他还是无法停下。他用力的，充满仇恨的，疯狂的，病态的用尽全力企图更为彻底的破坏这辆自行车。但似乎无论他如何实施自己的暴力仍然无法解除心中的愤怒和仇恨。对于男主角的殴打更为残忍。他已经毫无反抗的能力，但是对他凶恶的施暴却没有半点犹豫。面对鲜血淋漓头颅，明显伤残的肌肤，面部痛苦的表情，和撕裂的呻吟，施暴者从容不迫，毫无人性地继续摧残他。从打手的眼神里，动作上，你无法把他想象成自己的同类。

红卫兵的年代和《十七岁自行车》的时间跨度至少有四十年。但是两个时期中反应出来的心理行为却如此的相似。也许暴力的原因有别：红卫兵是为了革命，<十七岁自行车>里的中学生仅仅是为了私人报复。似乎任何理由都能够诱发他们内在的暴力和仇恨。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少年内心的恐怖和狂躁。而这种内在的积怨已经深深的压抑在他们的心底。只要遇到机会，就会彻底的爆发。文革也许是他们尽情狂热发泄这种情绪和心理的最佳条件。没有管制，权威，道德，只要你有内心的愤怒，就可以任意的宣泄。而这种内在的愤怒和积怨并不仅仅属于60年代的孩子们。《十七岁自行车》里中学生的残暴一点也不亚于当年的红卫兵。如果他们生在文革时代，也会做出同样的暴行。

那么，青少年内心深处的仇恨，愤怒，积怨从何而来？笔者认为主要来自中国压抑的文化。我们再来看《十七岁自行车》里的一个情节。当剧中的父亲发现儿子的自行车并不是正道来的，便在大门口训斥儿子。于是儿子大怒。他歇斯底里的狂喊，责怪父亲不守信义。儿子的怒气，愤慨，冲动像要把多年的积怨统统发泄出来。他的神情充满暴力和绝望，他的内心到处是疯狂和焦虑。儿子的举动似乎震惊了父亲。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会如此的暴怒，显示出十分陌生的一面：无奈，失控，没有理智。试想，如果儿子是文革时的中学生，并允许胡作非为，他的

怨气和激怒会发泄在谁的身上，可想而知。文革时的父母，一定会有非常相似的感觉。仅仅一夜之间，父子反目为仇，再也看不到以前乖巧，听话，顺从的孩子了。

中国的传统教育沿袭古典社会的一套宗法制度。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虽然提倡新的理念，但旧时的影响仍然主导家庭和社会。男人为一家之主，绝对权威。对于后代的培养毫无情感的交流可言。对于古典的家族，男人娶妻生子，天经地义。但孩子出生之后，如何教育成材，便是严父出孝子，一套严格的家规祖训。稍有出轨，则棍棒伺候，大打出手。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只有言从必信，没有平等的讨论，更谈不上促膝谈心，平等待人。学校的一套仍然是师道尊严，体罚训斥，极为普遍。此外是长辈，老师对学生的语言摧残，尤其对那些后进学生，竭尽侮辱之能事。笔者就多次听到一位数学老师对学生谩骂：天生的贱骨头！对于中小學生，在此压抑的文化氛围里，从何建立自尊，自爱，只有心中日积月累的愤怒和仇恨。更何况少年心理极为脆弱，很容易孤助无援，自卑自闭。于是，他们倾向于叛逆和暴力。即便在文革之前，笔者曾经目睹学生之间的群架斗殴事件，场面惨不忍睹。仅仅十几岁的孩子下手之狠，令人发指。如果是心理健全的少年，难以所为。这种内心愤怒的发泄，像是血海深仇，不共戴天。除此之外，少年摧残动物的事件更是屡屡发生。他们残杀猫狗，血腥成性，旁观者视为乐趣，面不改色。

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一个被摧残的幼年和少年，是暴力心理的起因。小时被暴打的孩子，会产生施暴的倾向。文革之暴力，笔者认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心理压抑的环境紧密相关。政治仅仅是当时历史的外在因素。《十七岁自行车》里的少年，并没有政治上的误导，仅仅是私人报复。但是，表现出来的暴力行为与文革没有本质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虽然家庭暴力十分普遍，但也存在著相对健康的家庭。同样是红卫兵，对于暴力会有鲜明的反差。即便红卫兵中，也有许多人拒绝参与殴打和暴力。笔者就看见一位红卫兵在血腥面前无奈的转过脸去，默然走开。可以肯定，他的成长，属于健康的一类。

暴力的另一个原由是性压抑。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是无性的时代。无论青少年还是成人，都必需极力从思想和行为上去除任何带有性的特征。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电影戏剧，对于一个人的描述和分析从结构上首先是阶级性，而思想则是革命性，而他的整体态度便要从个人的历史中去鉴定。至于他的人性，必须忽略，遮掩，压抑。这种去除性的倾向在文革中更进一步的走向极端。在中世纪，每一个人的人性是用“神性”来鉴定的。每一个人能够在社会上作为个人存在必须首先是基督徒。离开了神，和对神的信仰，他就不能成其为人。在文革，及文革前，个人的定义显然取决于阶级性，政治性，党性。五、六十年代的青少年，恐怕都经历了极大的性挫折感，因为与异性接触，交异性朋友，或者表现一种对异性的渴望都是犯禁的。大学不准谈恋爱得规定好像是在文革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才解除的。极度的性压抑造成他们心理极大的扭曲。深度压抑的性心理必定会寻求发泄的机会。而发泄的方式往往是通过暴力的手段。在心理学上，性与暴力在人性的底层紧密相连，并且可以互为转换。性的释放可以是罗曼蒂克的，健康的，适宜的。但也可以是暴力的，扭曲的，破坏性的。对于性压抑的少年，他们心理充满恐惧感和对自己性的迷茫。这种极度的不安全感和恐惧心理使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他们只能在施暴的时候才能够短暂的获得一点安全感和控制力。

青少年暴力倾向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在幼年和少年时期没有来自父母在感情和身体上的关爱。许多五六十年代长大的孩子说过，在他们的记忆里从来没有来自父亲和母亲的拥抱，抚摸，和亲吻。更没有享受过语言上的爱抚，比如听到父母对自己表示一种直接，明了的关爱之意。来自父母的，尤其父亲，从来都是严厉的教诲和大声的呵斥。从现代心理学的观点出发，这样长大的孩子是最不具有安全感的。在他们心理更多的是恐惧感。上世纪六十年代，科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将很小的猴子分成两组，一组和母亲在一起长大，一组完全关在笼子里而没有母亲。很快，科学家发现，有母亲的猴子非常自然，放松，安全，并允许

外人的触摸。而没有母亲的猴子显得相当焦虑，恐慌，不安全。在外人接触时大声吼叫，并做出威胁，防御的姿态，同事带有极强的暴力倾向。科学家发现，有母亲的猴子在母亲那里得到充分的关爱，他们几乎每天大部分时间是抱在一起的。小猴子无时无刻的得到母亲的抚摸和身体的接触。于是科学家做了另一个实验：他们把小猴子放在一个没有母亲的笼子里，但是在里面放了一只毛茸茸的假母猴子。科学家发现，这些小猴子分别和假母猴子抱在一起而寻求安全感。几乎每一时刻，假母猴子的身上都会有小猴子抱着。结果，他们发现，即便母猴子是假的，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猴子也比那些在完全孤立的环境下长大的猴子安全的多。于是他们得出结论，一个幼年猴子的长大，不仅要有父母的关爱，而且还需要肌肤的触摸。如果没有身体的触摸和语言的交流，猴子的长大会充满不安全感。而不安全感是恐惧感的根源，也是暴力的起因。因为实施暴力的目的是在盲目地寻找安全感和排除恐惧感，在短暂的时间内好像可以得到制控。猴子的实验完全可以运用到人类。于是心理学家鼓励父母在婴儿的时候就开始抚摸自己的孩子，以此减低孩子的不安全感。即在儿童和少年时期，抚摸，拥抱，亲吻是极为重要的表达爱意的方式。儿童可以从中得到极大的安全感，以至自尊，自信。而一个孩子的成长完全是通过对父母的感情和语言交流。孩童的学识可以通过上学而得到，而感情成长却依赖于和父母亲密无间的关系。如果父母不能提供这种环境，孩子仅仅能够在学校学到知识，但是在自我认识和感情意识上却止步不前。许多那个时代长大的孩子无法在感情上与异性交流，就是幼年时没有与父母交流的结果。

一个不安全感很强，恐惧感极深，时时有失控意识的青少年是最具有暴力倾向的。因为他们可以在暴力中得到短暂的安稳和控制。五六十年代的长大的孩子或多或少都有这种倾向，因为他们是在这种文化下长大的。文革给予他们大规模施暴的可能，于是他们不稳定的情绪和不安全的心理忽然得到发泄的机会。学校的老师平时清规戒律，师道尊严，正好是他们的目标。于是他们第一次感到自己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一切都可以无所不为。他们突然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好像世界一下子控制在自己手中。他们多年积压在心中的郁闷，愤怒，仇恨统统可以在暴力中得以发泄，包括从来没有得以释放的性渴望。

也并非都是父母的错，因为父母也是在同样的环境下长大的。中国的文化如此，千百年来，代代相传。文革可以说是一种对中国文化的心理检查。虽然那时的社会从表面上看流行红色政治，破除旧中国理念，抵制西方思潮，但是在骨子里还是孔孟的一套。文革之后一位美国记者访华。他问一位中学教师：建国三十年来你们是用什么来教育自己子女的？老师回答的很简单：孔子。一语道破天机。即便是今天，孔孟的许多理念还在中国流行。它不仅反应在教育上，而且充斥文学，影剧，和人际关系中。

惨不忍睹这个成语是用来描述人类的。因为在屠杀和血腥面前只有动物才会无动于衷。但即便人类也分为两类：一类不仅制造血腥，而且可以在残杀中得以享乐；而另一种却的确无法正视血腥，必需转过头去，满怀恐惧，悲伤，痛楚，和失望。后一种才是人类的情怀。之所以称为人类，是因为在血腥前会自然地产生这种情绪和心理。我们说这是一种正常，健康的反应和心理。如果一个15岁的少年在鞭弑自己的老师的时候能做到面不改色，从容不迫，那么他肯定有十分不健全的心理。任何一个健康的人，有幸福童年的人都无法做到这一点。从现代心理学的观点分析，五六十年代长大的孩子或多或少都经历了心理的创伤，否则，他们无法成为文革暴力的凶手。而这种创伤的根源显然来自文化。必需指出的是，参加暴力的学生绝不是每一个人。我的周围有许多属于“惨不忍睹”的一类。他们在血腥的打斗面前显得面部苍白，不知所措，但他们却是健康的一类。

文革已经过去多年。笔者更为关注的不是五六十年代长大的孩子们，因为他们已经成为父母。或许他们在仔细的思考自己的过去，更加小心翼翼的珍惜自己的年华。而令人担心的是《十七岁自行车》里的少年们。他们似乎在重复父辈走过的道路，仍然充满内心深处的恐惧和不安

全感，因为他们父母的父母也是一样，没有拥抱，没有抚摸，没有亲吻，更没有经常听到父母爱意的表达。

华文的评论界，多以政治为主导。几乎所有的文章除了分析当时的政治和历史，就事论事的追究某些人的责任，就是简单的谴责文革，揭露红卫兵的暴行，以及痛斥当时参与者。但是关于社会 and 人性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少年会如此暴力？那时的青少年是否有健全的心理？父辈们是否有健康的心理？中国的文化是否与文革的暴力相关？诸如此类，重多论文却没有给出答案。相比与西方评论界对纳粹德国暴行的分析简直天壤之别。本文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心理学专家参加讨论。

◇ 附：网友评论、讨论摘录——

老骆：我也看了《十七岁单车》，看片时想起了《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两部影片似乎可以放在一起谈，在受意识形态输灌最浅的我们这代人，同样痴迷于暴力，这就应该和人性又关了吧……乱发议论了，各位继续。

wmsyjr\_\_1919：我认为，问题的实质是我们没有对文革爆发的制度性根源给与说明。文革是极权政治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发展的顶峰，它借助了自然科学的力量（如通讯、报纸印刷、广播、电影、现代杀人武器等），这些为极权政治按上了核动力。这与中国古代的极权政治不仅仅是程度上的不同，因为没有现代自然科学的力量，古代极权政治基本上是在宫廷官宦之间展开，文革则是在6—7亿人口中开展，在庞大的地理舞台上展开，在现代文明的包围中开展。这不仅是中国人的灾难，也是人类文明的灾难。我们今天对文革的反思是有官方定论的，什么由领导人错误发动，被野心家利用……应该也必须以今天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参照系，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灾难？如何才能防止？这样问题才有意义。

年大六：时先生这篇文章倾向上的毛病，就是把传统文化简单化，以偏概全。传统不可超脱，但传统的现实的作用，关键在于现实的政治力量互动做出了总体性选择的性质。毛泽东的选择是现代极权主义选择，按照他的“主义”重铸出了所谓新传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等。

传统的皇帝最多以“天子”自命，而且还必须“以德配天”；毛自己就是“红太阳”、就是“天”，自己的思想就是“天命”（所谓历史发展必然规律），这在古典传统政治文化主流中恰恰是被否定的“暴君”“暴政”思想，怎么能把他破坏中华文明复兴的现代极权主义思想造成的恶果算到中国传统帐上？

我们这代人是“红旗下长大的”，对1957年之后主要是毛泽东个人专断造成的中共政治极权转向产生的种种病态社会、病态文化后果可以说是切肤之痛。建政初、抗日民主根据地阶段是良性文化阶段，共产主义文化的良性方面发挥了很大的历史作用。毛有的做法是自己打倒自己，自己否定了自己民主革命的贡献。当然不是说从前他的思想就没问题，而是主流方面必须历史地予以肯定。

无论哪个阶段，“改造思想”导致的恶性后果尽人皆知，不赘。

知我何求：当有人批评中国人情愿当奴隶不敢反抗暴政的时候，将其归为孔孟之道的教化。现在，当有人批评现在的中国人有暴力倾向的时候，也将其归为是孔孟之道的教化。孔孟之道经常教育人们温文尔雅，什么时候教育人们搞暴力革命了？

wmsyjr\_\_1919：文革暴力源头是什么？我的看法是有三个，第一：极权专制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管以什么面目出现，什么共产主义啊，什么爱国主义啊，什么阶级斗争啊，它的本质是邪教。如果我们承认法什么功是邪教的话，那我们对比一下，两者哪一个更让人疯狂呢？前者与后者比，不过是街头小贩了。所以，按逻辑，这种意识形态必然是邪教。第二：穷人对富人和由权而富或贵的人的仇恨。文革的主力是穷人。想想看，今天如果有“合法性”的强夺私人财产的运动，中国会是什么样子？第三：当权者利用了青少年的心理特点，这是非常无耻的。后两条是人类共性，它只有在邪教的土壤上才能爆发。所以我同意楼上宋逸人观点：是意识形态的邪教化，使文革成为人类历史最悲惨的一页。所以不废除这种意识形态，悲剧还会有。问题是我们的多健忘啊！

年大六：就古典传统主流而言儒道佛都在起作用，不是单一的。我的双亲就没有压抑自己孩子天性的那一套。我们一位邻居的父亲就是贾政那一套。传统具有内在的异质性和多样选择性。我母亲基本信佛，父母年轻时都是一贯道一般道徒。对六七个孩子很温情、总是说善有善报之类。所以文革中无一人参与暴行，尽管担任群众组织头头、造特权官僚反坚决得很。但还是把他们当人对待的。相反，极权意识熏染很深的特权官僚搞运动往死里整人不遗余力，暴政自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敢干。

总之，不要简单化。比如并非干部、领导都是特权官僚。我们一位邻居是工人中成长起来的党支部书记，个人品质极好，英年早逝，单位和街坊自发追悼的许多人都是普通老百姓。

像风波中直接下令向大规模聚集的人群开枪的人，决不是什么好人！中国文化有这个传统？瞎扯。还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现在还坚持为这种伤天害理的做法辩护，是党耻，国耻！

可见这个党堕落得多深！不脱胎换骨改造怎么能行！我是赞成民主共产主义信仰的，决不赞成任何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把人变成野兽。多少年的经历证明这一点。

陈朱鹤：时先生的见解，有点舍近求远。直到现在，我们的孩子还在学习“对敌人要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这是革命者的优秀品质，手段越残酷，越残忍，则越革命，这是最高标准。至于是不是真的敌人，那不是他们关心也无法过问的事，有伟光正同志在把关。

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就是刘少奇同志也教育我们，人性就是阶级性。狼奶喂大的孩子，斗争哲学的人生观，以暴力为光荣的教育，这个暴力源，与孔孟之道何干？

宋逸人：文革暴力的源头很简单，那就是马列共产主义的原教旨极端，就像阿富汗的塔利班一样。中国的问题其实把宪法作为基本方程再考虑中国具体的初始和边界条件就可揣摩出个大概，其他什么孔孟之道的解释只能起到帮倒忙的作用，最多是帮闲。

□ 原载《燕南》网站

~~~~~

【难忘岁月】

《风雨人生路》转载（之四）

• 刘文忠 •

“图穷匕首现”

1967年二、三月间，好久没有被提审的我，突然来提审我二、三次。本来我与同牢房人和睦相处，他们处处看重我，天天喊我“小兄弟”；我也事事帮助他们，主动热诚地替他们服务。虽然关押在暗无天日的牢狱中，我已精神乐观，经常嘻嘻哈哈，牢房里笑声最多的是我。可是这几次提审回来，我却忧愁郁闷，心神不安。每审讯一次，我总要一两天精神恍惚，惊惶失措，似乎恐怖死神形影不离我的脑海。犯人在看守所是未决犯，判决后移入市监狱服刑。而在未决犯人的心间，似乎凌空悬着一条钢索，受审讯便是走钢索。犯人提心吊胆不敢有丝毫大意，一步踩空便会坠入深渊。犯人与审讯员常是斗智斗法，当然犯人处在极端劣势，可一些有经验的犯人就是靠“智慧”得以苟延残喘。

我深夜冷静地回忆审讯场面，应该说比刚进牢时那三天四夜的密集严审的气氛要缓和得多。原先那凶神恶煞般的矮胖审讯员，也没有表现过一次暴跳如雷。而那位年长消瘦的老审讯员，我早已从熟悉公检法内情的11座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处了解到，他是颇有资深阅历的审讯处头头，应该是我案件的主审员，向来态度严峻而神色温和，在这几次审讯中，更显得和颜悦色地不断开导我要珍惜自己，划清界限，重新做人。就他们提审的问题来分析，对我国庆节杭州投递匿名信一事简略带过，似乎早作定论，不再重复了。而着重详细地审问我所知道的辉哥平时的“反革命言行”。我猛然想到，他们重点是想从我嘴里掏取辉哥的“罪证”，这……将会发生什么了呢？我越想越感到六神无主，久久不能入眠。

邻铺11座大学生见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悄悄问我为何事。我回答他提审骤然加多，内容又不全是自己的，而是哥哥文辉之事。他毕竟是政法大学的毕业生，熟悉一般的审讯规程。他告诉我，看来对你的案子快结案了，而对你哥哥的案件也要结案了。你哥哥是主犯，且前科已是右派、反革命，加上这次“现反”，又是直接攻击毛和毛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估计再也不会宽恕他了……。听他这一说，我似乎活活看见，专政暴政匕首直插辉哥的心胸，惊吓得我浑身颤抖不止。他见我如此，反而安慰我说，你自己是从犯，估计判七年八年、十年以内徒刑，不要过分紧张，还得活下去。

我定了定神，把自己作案的经过告诉大学生，向他讨教出事的原因何在？他做过审讯员，是内行，对我说：上海地区破匿名信的效率很高，人员也精干。他们查匿名信作案者首先从信纸信封与邮戳入手。因为这时（计划经济）文教用品只有几家国营单位印刷经营，是规范地从省市二级文教批发部运送到各零售商店，上面都有编码记录，完全可以查出这信纸信封是哪个市、哪个省生产出来的，是通过哪个文教用品批发部发往哪个地区进入哪家商店的。这样一查，范围就大大缩小了。其次查邮戳，你虽到杭州投寄，但犯了一个错误，从杭州火车站开始一路投发，公安马上可以推断这是一个外地人坐几次列车从哪里到杭州来活动的。另外信的内容，你哥有这么大胆量，这么全面系统攻击反驳文革十六条，就为公安断定此非等闲之辈，至少不是一个初犯，这个作案人非同寻常，不怕死，血气方刚，肯定有类似的反动思想暴露的前科，这样侦破的范围越加缩小了，目标锁定在少数顶尖的思想嫌疑犯身上。如果已从信纸信封邮戳推断出是上海人所为，那么接着要找你哥哥这样几次同政府思想对抗的人就容易了。因为你哥哥66年被押回上海管制，他的档案全在市公安局手里。像你哥哥这样30岁的“现反”，肯定是地区派出所、公安民警、里弄干部对他日夜重点内控对象。最致命的是你借了别人红卫兵袖章外出串联一事，加速了东窗事发，案子败露。既然是投寄全国十四所著名高校的反革命匿名信案件，中央公安部督令北京上海及全国各省市公安局合力围剿，你与哥哥怎能逃出这一致命打击呢？……经大学生如此详细分析，我才恍然大悟，辉哥唯是拼死抗击毛的倒行逆施，企图阻止罪恶滔天的文化大革命，全然不知所作所为跳不出当局的巨掌心，辉哥常说的“不自宁毋死”的评语，岂非真的不幸而言中乎？！

记得3月10日那天，看守叫我“1548提审！”我却不是被带进通常的审讯室，而是来

到一间会议室。在走廊门口接我的审讯书记员告诉我：“北京来人了，来决定你哥和你的命运，态度放老实些。”我心头一阵震颤，原本残疾的左脚走路更无力了。当我走进这间会议室，一眼看到有几只喝茶的瓷杯被摔碎满地，一只椅子被折断了脚，发觉好像这里刚刚发生过一场争斗。一见我进门，几位怒气冲冲的北京口音的人就破口大骂：“你哥死不悔改，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你这个现行反革命，是否要同死硬的你哥一起走死路吗？”……一阵当头棒喝般的下马威，使我心里顿时冷却如冰，目瞪口呆，喉咙好似被一团苦涩塞住，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还是老主审员指着一张椅子缓声慢调地叫我：“先坐下来吧！”他们再一次审核了我国庆节去杭州投寄14封匿名信的事，又审问我与辉哥同住在16室半年多的情况，特别是辉哥深夜私自观看大字报，回来又宣布了哪些“反革命言论”？最后又要我交代有哪些人同伙作案犯罪知情，其它兄弟参与活动情况。我有气无力地回说：“该说的全都向政府坦白交代了，再也没有隐瞒的情况，至于所谓团伙，其它兄弟，全是你们猜疑，就是枪毙我也没有的事……。”我越说越气愤填膺，语调也高声起来，最后竟不由自主地声嘶力竭。说完后，根本听不进北京人暴跳如雷斥骂，我只是钳口不语，沉默喘气。

我回到牢房，把提审情况如实告诉了11座大学生，特别是在会议室北京人来审讯的怪事，又见可能发生过打斗的现场。大学生沉思了片刻，对我分析道：“你哥与你的案子结案快速了。”他从“北京来人”推断，此案已作为公安部抓的重判重刑的典型。估计在我进去前，刚审讯过我哥文辉。辉哥不甘屈服、秉性刚烈、宁死不认罪的态度，遭到北京来人粗暴的打骂，由此引起辉哥的决死反抗，造成现场杯碎椅折的狼籍状况。大学生最后不无同情地鼓励我：你要坚强再坚强，要准备经受人世最大的痛苦（失去亲人）。他特地赠送我一句英国思想家培根的格言：“厄运能锻炼人的坚韧。”

这天夜里，我又通宵失眠了。一搭上双眼，辉哥声音容貌就显现在我面前。那是一次我带回一张北京红卫兵小报，报导著名老作家老舍投太平湖自杀的消息。辉哥看完后激动地说：“老舍是含冤不白，为了保护自己灵魂的纯洁，所以投入太平湖。否则他不要灵魂，也可以像55年反胡风、57年反右，一味地妥协下去。如果他能在天安门广场自焚，他的灵魂升华更光辉。他是中国知识分子以一死唤醒知识界反抗的典型。”辉哥又说到，在中国近代史上勇于讲真话而不惜以生命抗争的胡风，称他为反对“绝对命令”，抗拒认同，“宁为碎玉，不做瓦全”的英勇殉道者。辉哥一再表示要以他为榜样，置生死于度外，誓同毛的“阶级斗争”、残酷镇压广大知识分子的专横逆施抗争到底！他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正是他睿智熟虑、以死搏斗的总爆发。想不到半年不到，辉哥的青春年华要被当局的铁拳毁灭了……。想到这里，我禁不住眼泪滴滴流淌，用衣服包装的枕头上湿了一大片。

第二天，所长找我去问话。我进所长室，看见是位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的老公安。他态度缓和地问了我辉哥的前科问题，58年在反右斗争“补课”中戴上右派帽子和64年因策划偷渡而被戴反革命帽子，66年押回上海管制等事情。他又谈到这次投寄反革命匿名信一案，说辉哥“立场反动，死不悔改，一而再再而三地与无产阶级专政为敌，是反革命死硬派。”叫我不要学他的样，而要老老实实改造，争取宽大处理。所长又奇怪的问我辉哥是否有女朋友？他是否有严重鼻炎，每天要滴药水，否则呼吸困难……？最后所长又显出关心我的样子，说：“像你这样20岁年龄，又是残疾人，在一所从来没有过，要珍惜自己前途，不要像上次再犯违反监规受罚，那是对你没有好处的。”

回到牢房，老犯人知道是所长找我，个个惊讶不止，说老所长是这里最有修养学问的，早年毕业于北大。犯人至多是训导员叫去训话，所长亲自叫去的很少，何况像我这样的新犯人，更是不必老所长所管的，看来案子特别严重。熟悉法律的11座大学生双目凝视我，久久不说话。我更预感到暴政当局“图穷匕首现”，辉哥有遇难的凶兆，阵阵恐怖、愤，剧烈地震颤我心头。不出大家所料，十三天后。1967年3月23日，我最崇拜的三哥刘文辉，竟被“文革

暴政”的罪人，押上上海最大的文化广场审判台示众后即日遭害了！而我在牢里还浑然不知，还在为他日夜担忧而幻想有一天能逃过劫难。过了整整二年零四个月后，我才知三哥被害真相。长歌当哭，魂魄归兮，再也见不到我敬爱的三哥了……！

监狱造反了

在华东地区关押政治犯、重刑犯出名的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内部也造反了。不是关押的犯人造反，他们都是不敢乱说乱动的囚徒；而是一所内部的管理人员起来造老所长的反，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起先我们这些在押犯人是毫无知觉的。那天门外叫喊提审我们牢房的一位老犯人。牢门打开，大家不由吃惊，进来押带犯人的看守不是原先那位，而是平时来送饭的伙司员“独眼龙”，只见他左手臂上戴着“上海市公革会”造反派红袖章。“独眼龙”神气活现地带走了犯人，把牢门关得“嘭咙”震天响。于是我们纷纷谈论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熊熊烈火烧到监牢里来了！”“造反，造反，这年头，什么都要反了！”“伙头军当上了看守员，原来的看守、训导员不知怎样了？”“老所长管了一世的监牢，说不定自己也要进监牢了……”2座老校长、11座大学生却默默不语，摇头叹息。

在一所，伙房里有四个伙司，应该说他们是最受犯人欢迎的。因为一听到他们“开饭”吆喝声，本来静坐的犯人个个来劲，人人伸长脖子，拼命嗅着鼻子，赶快站起身来，我快步站立到牢门边，倾听他们的脚步，预测他们来到本牢房门口、掀开送饭小框洞的时间，丝毫不间断地承接他们伸送进的饭菜。犯人们每星期除了周五有一小块红烧肉外，几乎顿顿吃的是市场上最便宜、质量最差的菜。大家给伙司们分别起了称呼：老山东、老宁波、独眼龙。这位独眼龙，虽然只有一只眼睛，但是一脸横肉，态度凶悍。几个月来，由于我殷勤灵活，承接爽快，并次次说声“谢谢管理员”，博得他的欢喜，所以对我态度还可以。谁知他这次也起来造反，真的窜上了“管理员”头衔。其实（据说）这三个伙司都是老革命，因无文化，只能屈尊当伙头军。伙房里另一位伙司是个年青人，犯人也称他“大学生”。据老犯人说，他也毕业于政法大学，当过审讯员，是因为与女犯人出了问题，才下放当伙头军。伙房是看守所内部的底层，造反往往是从底层的人们开始，这在一所也不例外。我们很快就知道：原来被下放当伙头军的“大学生”，一夜摇身而变，当上了看守所造反派头头。独眼龙与老山东都戴上了造反派红袖章，窜升为看守。原来对犯人态度恶劣的管理员，有的升为训导员，有的保持原职。有几位对犯人态度比较温和些的管理员都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原来的训导员让位降为看守。而那位被老犯人称“有修养有学问”的老所长却进了牛棚（关押牛鬼蛇神的“简易牢房”），后来又听说他到“五、七干校”去啃泥巴了。

由于监狱毕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地，是关押成千上万犯人的场所，不能随便作乱起来，所以文革造反狂风巨浪起先很难刮进这里来。直到市革会成立，大局基本稳定，“砸烂旧公检法”的呼声甚嚣甚上。67年春夏之交，第一看守所内也准许抢班夺权，生活腐化的伙头军造反当头头了。从此世道真的变了，造反派改变了原来的监狱面貌，把社会上一整套对付四类分子的违法手段也刮了进来，造反派看守对犯人的打骂、体罚加重了。上班的看守都带着红袖章，表明他们与旧公检法划清界线。牢房大门、走廊、审讯室和放风场上，到处悬挂、张贴着“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敌人绝不施仁政”“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长条横幅、大幅标语。原有的“放风”规定取消了。犯人每天的定粮减少了，三顿缩并为二顿，开水供应从每人1500CC降为1200CC。造反派看守说得好：“这叫做‘节约闹革命’！”和“绝不向敌人施仁政”。他们自己忙于天天开会，学习毛泽东思想会，批斗走资派会，相互间勾心斗角、罢官夺权大会。他们中不少造反派还忙于外出串连，参与社会的批揭斗争活动，所以监牢里管理人员越来越少见，原先一层楼看守有二、三个，现今整个三层大楼内，很少听见看守的吆喝声。

犯人们每天吃的饭菜、开水减少了，整天被关在斗小房里，丝毫没有出门活动的权利，牢门外看守管理人员稀少，监视放松，于是大家在牢房里随便聊天，谈古说今，甚至肆无忌惮议论外面政治、文化大革命，没有人来管束，精神上反而放松了许多。我却趁此机会深一步向同牢房的人请教学习各种知识。

大家在牢房里说东道西，自由畅谈，有些犯人却愁眉苦脸，沉默度日。因为监牢内部造反派忙着批斗夺权，对犯人几乎不再提审了，而提审停顿必然推迟结案，使得不少犯人心中遥遥无期地苦等。我问11座大学生，你是学政法的，难道国家没有什么公检法规程时间限制吗？大学生苦笑回答：“有了都可以推翻，不要说没有。现在造反了，时局大变，一片混乱，以后不知道又该怎样了？反正是不明不白无限期的囚犯，真的要把牢底坐穿了！”在第一看守所，长期关押带来的饥饿、疾病、非人待遇并非是犯人苦难的全部，犯人真正的痛苦是叵测命运对精神的压迫与恐惧，最大的折磨是漫无尽头的未决等待过程，一年、三年、五年……躯体的饥寒交迫与心灵的恐惧无奈迭加在一起，这就是一个政治犯的生涯苦难。

“卸磨杀驴吃”

“1548，调房。”牢房外年轻的新看守高声又清脆地叫喊。我不由一愣，自己近半年多来与同牢房十一位老犯人相处融洽，不犯任何差错，听看守声音也不含怒气腔调。牢门打开，看守进来态度平和地招呼大家说：“今天监狱大调动，大家快整理好东西，你1548先搬。”大家都很奇怪，好像楼上楼下，左右对面牢房都在通知调房，走廊里涌集着不少荷枪的军人。老犯人都说“这是少见的大调动”。我是66年进来的，对比其它十一位来说，也是新犯人，首先被叫到番号调房。

我自66年底关进204室，至今67年8月上旬，同十一位老犯人同住了九个多月。这200多个日日夜夜，似乎结下了生死友谊，我从这些可尊敬的长辈与朋友处学到了丰富的知识与做人的道理，特别老政治犯身上洋溢出来的不屈不挠追求真理的素质给我很深影响。今日要分开了，不知今生今世能否再见面。同关一座监狱，但房号不同犹如咫尺之间远隔天壤。我茫然而依依不舍地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好得这次看守从未有过的耐心，不来过问、阻止犯人之间的道别。2座老校长紧紧握着我双手，沉重叮嘱道：“小兄弟，监狱是座大学，能磨炼人。你年轻，不象我们老了，争取好好地活下去。”11座大学生也深切地鼓励我：“不管发生多大苦难，你要顶得住。进来是阿瑟，出去做牛虻！”对着他们的谆谆嘱咐与勉励，我激动地流下了热泪，难分难舍、三转四回头地走出204牢房，频频招手告别政治犯生涯中首批启蒙老师。

我站在走廊里。看守从一间间牢房中叫出人来。我们这批集成八个犯人，被带到三楼302牢房。陆续进去，才发现里面原来有二个犯人，其中一位是盲人。大家坐下来互相一打听，都是不同牢房调来，但有一个共同点，全都是66年文革开始后进一所的。而各人原监房的老犯人通知准备好行李，并没有与我们这批人一起调房。由此大家推想，这次调房是要把新老犯人隔离关押，界限是66年“文革”。我们顾不得整理自己行李，纷纷站近窗口、门边细心寻听，猜测这次大调动真正原因。只听得乒乒乓乓开关牢门声音，走廊、楼梯传来串串踢踢脚步声，看守在不断通知：“底楼，三楼下来了。”“底楼，二楼的犯人下来了。”这天调动从午后开始持续到四点多钟。最后我们牢房又进来一个由底楼108室上来的犯人。他原关的那间刚好在楼底走廊出口处，几乎洞察了调房全过程。他说，底楼门口一直在点名（番号），起码有几百人，押出第一看守所。一些年老体弱拿不动行李的犯人，由劳役犯帮助搬上警车，后来催着发车，解放军也上前帮搬行李。接连发出十多辆警车。这使大家感到惊奇万分。从看守与军人的脸上，也未见凶神恶煞形象，不可能这么多犯人拉去公审或行刑，那究竟为什么呢？

十多位素不相识的犯人相居一室，开始几天静默的多，交谈的少。相处一周下来，大家就显似曾相识了，尤其像我总是主动热诚地帮这帮那，多数人都愿意与我交谈起来。我想从各个不同牢房里出来的难友嘴里打听辉哥的消息，很失望。却得知在一所几乎每间牢房里都关着一些社会名人、学者、外籍人士，如他们告诉我同毛选里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大右派孙大雨，名演员赵丹同监的一些情况。而类似涉及充当美国、英国、苏联、日本等国情报机构和台湾特务，来刺探中国情报的外籍人士几乎每间都有，可以说一所是华东乃至全国关押重要未决政治犯人的重地。这次调动，他们众多老政治犯去哪里了呢？我们心头纳闷异常。

我又从刚进监的新犯人嘴里，陆续了解到有关真相。原来上海一月革命爆发后，定于二月五日建立上海人民公社，正在紧张筹备全市隆重热烈的庆祝活动，不料一月二十八日，以复旦大学红革会为首发难，掀起了“一二八炮打张春桥”的全市大行动，上海南京路、淮海路等各大马路上，全市数十所高等院校内，贴满了“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外滩海关大楼顶层，十多只高音喇叭同时由“红革会战士”播放：“打倒大叛徒张春桥！”“揪出隐藏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身边的大叛徒张春桥！”全上海又一次大乱起来。红革会扬言在一月三十日举行炮打张春桥的全市大游行。面对突如其来的当头袭击，正得意洋洋要当上海市第一把手的张春桥吓得躲在兴国宾馆里不敢露面。他的贴心死党、已定窜为上海市第三把手的王洪文，紧急动员、调集十万他领导的工总司造反派人员，上街同红革会对抗；张春桥另一个余党，原上海市委机关造反派头头、已定上海市委核心人员徐景贤，被红革会头头们绑架到复旦大学。就在这时，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发来电报，声明“炮打张春桥的大方向错了”，又说“红卫兵小将们不要被长胡子已打倒的走资派所操纵”……。三天以后，上海炮打张春桥的浪潮被平息，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庆祝大会上，张春桥容光焕发、精神抖擞地宣称，“对红卫兵小将不记这笔帐”。但是不久，他在上海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整顿造反派队伍的大行动，红革会中的一批参与炮打张春桥的激烈派头头一个个都被送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被秘密逮捕关押起来。

接着，张春桥指使王洪文的工总司造反派在全市范围内对原先保上海旧市委陈丕显、曹荻秋工人赤卫队组织彻底摧毁，又抓捕了一些赤卫队头头。上海柴油机厂组织了“上柴联司”，坚决对抗王洪文一伙清洗赤卫队的行动，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纠集几万人，一个名叫全向东的人登台揭发王洪文原在上棉十七厂及以前当兵时的不光彩老底。王洪文恼羞成怒，在张春桥老谋深算下，于67年8月4日，带领了几万人，直冲上柴厂，展开了震动全市的“八、四砸联司”大行动，联司头头们包括全向东都被抓捕关押，上柴厂被打砸踏平，现场武斗惨不忍睹。同时王洪文对同情上柴联司的工总司内部二兵团头头耿某以及不听他话的一兵团头头潘某等人采取了清理队伍行动，又抓捕了一大批所谓“老造反中的坏分子”，或称为“新生的反革命分子”。

随着“文革”运动步步深入，大批所谓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像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并立即被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彻底粉碎，千千万万的新生反革命分子被捉拿归案，全国监狱人满为患。从此一所成了上海市重大严重新生反革命分子的收容所，而凡文革前进所的数百名老犯人或转入提篮桥市监狱，或转到二所，市级著名人物也被关入漕溪路的少教所。我调房关入的302室牢房中，不断进来了红革会头头，二兵团头头，上柴联司头头……。一间十六平方米小牢房，最多时关押犯人达16名。白天连水泥马桶盖上也得坐人，黑夜大家似一圈猪猡贴地挤睡在一起。比之他们来说，我们几位政治犯资格老了许多，所以常对他们不无讥讽地说：你们这些“乱世英雄”，无非是一头头供人驱使的蠢驴，卸了磨被杀驴吃，革命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殉葬品。

“文革”优劣论

毛泽东以他的雄才霸略，如椽大笔，写过许多篇战斗檄文。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百万雄师下江南之际，他发表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曾响彻华夏，震惊

中外，鼓舞民心，脍炙人口。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李宗仁代总统领导的南京政府，与蒋介石一样都是企图与人民为敌到底的国民党死党。他呼吁中国人民“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并引用春秋《左传》上的典故，说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历史常会嘲笑现实的人们，常会出现惊人相似的现象。事隔八、九年后，在我被关押的一所302室牢房中，同样发生了一场“文革”向何处去？“文革”优劣论的激烈争辩。

在302牢房，我结识了一批新难友。一座是位音乐家，上海交响乐团总指挥，音乐家贺绿汀师弟后又拜贺为师，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二座是我。三座姓胡，是个三次偷渡失败的“叛国反动分子”，大家戏称他为“职业政治犯”，我尊称他“胡兄”。四座是复旦大学学生陈某，父亲是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他在学校被作为“参加反革命组织”清洗进监牢。五座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红革会头头。六座是中山医院医生，第一医学院毕业。七座是师范大学教授。八座是上海赤卫队头头。九座是位双目失明的徐家汇天主教堂终身修士。从十座开始，是陆续再进来的“联动分子”，工总司反王洪文的兵团头头和“上柴联司”头头。他们的铺座直排到墙角水泥马桶上。总的都自“文革”开始，“思想反动”，被投入牢狱的；但十五、六个犯人中，明显分为两派。我、胡兄、教授、修道士、音乐家等一开始就反对“文革”的人占少数，约三分之一；而起始积极参与文革，后被清洗出来的“新生反革命分子”占大多数，三分之二以上。我们这些“标准政治犯”，激烈反“文革”派的少数人，同他们“衷心拥护文革”的多数派，各持截然相反的观点，展开了明争暗斗。

蹲进监牢的这些造反派头头、红卫兵小将和高干子弟囚犯，一开始很骄横，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是忠于毛主席的响当当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作过重大贡献的英雄，与我们这类铁心反革命，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有着本质的区别。为此，双方争辩的第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就是文化大革命究竟好不好？对不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是反修防修的伟大革命运动。”“是防止红色中国重蹈苏联覆辙走修正主义道路的革命创举。”“是彻底粉碎中国赫鲁晓夫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群众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用当代马列主义武装全中国人民头脑的一场全民教育运动。”……他们争先恐后，七嘴八舌地宣扬“文革”的伟大意义，脸上无不流露着自己能亲自参加这场“大革命”而自豪的神色。

我与胡兄是最坚决反对“文革”的。我毫无顾忌地把辉哥长期灌输我的，后又在204牢房中受到老犯人们启导的激烈观点和盘托出。我认为，“文革”的要害是全面剥夺了中国人民最起码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权利，残酷地镇压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代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水平的全国著名大学教授、学者、作家无一例外地遭受惨无人道的摧残与迫害，甚至残酷无情地打击共产党内部的国家栋梁、正直有为之士，是毛泽东自毁长城，对全党、全国、全民犯罪。三座胡兄似我三哥一般，列举毛泽东自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惯用康生首倡的“无情打击、残酷斗争”路线政策，解放后反胡风、57年反右派、现今大搞“文革”搞下去，中国大陆已没有希望了。他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却早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被逼死在劳改处。他母亲也打成右派。为此62年高中毕业因家庭问题被发配到新疆“工作”后，就设法偷渡出境，但失败被送劳教。他在劳教处潜逃到广东中山市企图偷渡又失败。他隐瞒了身份，被押在一个采矿厂劳役，再一次脱逃，从广东海陆丰暗中偷渡，几乎成功，但靠香港海域时再次被抓捕，66年初押回上海关进一所。他认为，毛发动的这场“文革”，大大超过以往政治运动的残酷力度，将会逼使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逃离大陆，大陆人民的生活将更加暗无天日，水深火热。

一座音乐家，番号1598。他说起一个师妹姓李的悲惨事例。她是音乐学院二级教授，原在海外生活多年，抱着一片爱国赤诚之心回国到母校任教。她保留着多年海外生活习惯。不

料“文革”开始，她的口红、胭脂、皮鞋被拿到大庭广众之下展览。她自己被辛勤培育的学生逼迫拿着簸箕扫帚边敲边叫“我是一个妖婆”。一群红卫兵围着她，对她吼叫谩骂、吐口水。她万分伤心地欲哭无泪，强烈自尊心的女教授哪能忍受这种对于人格的侮辱与摧残？当夜，她含愤自尽。临死前，她最后一次为自己涂上口红，画好眉毛，来向那践踏人权尊严的所谓“革命行动”及那些愚昧而被骗上当的学生作誓死抗争。一座愤恨地说：“这是什么文化大革命？这分明是在大革文化之命，大革知识分子的命。一个连自尊心都没有的人所组成的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我们知识分子爱国，却没有人爱我们。许多回国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他们放弃国外优越生活、丰厚报酬，回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不料招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动辄因‘文字狱’身陷囚牢，逼使他们怨怪自己‘早知今日，何必回国’。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非把中国搞垮不可！”

面对我们对“文革”理直气壮的批驳与血泪般的控诉，有些造反派头头们还是固执坚持“文革”本身是“革命行动”，毛主席本意是伟大的正确的必要的，只是毛主席身边隐藏着奸人，故意挑起派别之争，他们败给了张春桥、王洪文等人，误落到反革命分子下场，但毛主席革命路线终会救他们的。为之，自作对“文革”多情的造反派头头竟偷偷地去向看守告发我和胡兄在牢房里搞小集团，与反动学术权威、大学教授等人私下散布攻击文化大革命、宣扬封资修的反动言论。幸好这时已造反了的监狱内部混乱一团，看守、训导员忙于内战批斗，对牢房犯人间互相告发无暇顾及，何况他们对我这位“老犯人”常当面“谢谢管理员”的习惯用语颇有好感，面对所谓“告发”又无具体证人，所以只是对我与胡兄反铐几天，以警告处罚了事。为此我与胡兄暗中策划对“文革派”造反派头头予以反击。

一次，有个工总司什么兵团司令的犯人，他一进牢房就对我们厌恶反感，耀武扬威地自我标榜，他是上海有名气的造反派英雄，是响当当的工人领袖，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他口口声声说与王洪文是老战友，一起在安亭卧过铁轨，并肩战斗炮打旧市委，说王洪文会来接他出去的。他对一些年老政治犯极尽侮辱之能事，抢盲人修士的饭菜吃，骂音乐家是个老顽固反动分子。三座胡兄与我商量要打击他的嚣张气焰，以杀一儆百，整一整自鸣得意的“文革派”。我们趁一个常骂“妈辣X”的看守当班时报告，因为知道他心狠手辣。他掀开门上小窗洞随口“妈辣X，什么事？”三座胡兄上去有礼貌地说：“管理员，有位犯人在监内天天叫着要见王洪文。”看守马上问“他是谁？”这个不识相的造反派司令上前搭话：“是的，我与王洪文是战友，曾经在安亭事件一起卧过铁轨……”看守未等他说完，立即狂怒叫骂：“妈辣X，你说什么屁话？！”这个自吹曾率十万工人造反大军的家伙顶了一句：“你不要骂人，我是革命派。”看守打开门，喊他出去。他一出门，我们就听到一阵阵杀猪猡似的急叫“救命”声，看守一路拳打脚踢地把他拖进训导室，便是一顿毒打。半小时后这个兵团司令被看守打得鼻青眼肿、反铐双手带进牢房。押他进来的造反派看守头头喝令他“消毒”。他只得低着头，吞吞吐吐地说：“我是工总司的叛徒，我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该万死。我是个囚犯，不是革命造反派。”说着还双脚瑟瑟地发抖。

看着这位“造反司令”的熊样，我们几位“反文革派”心里出了口恶气，但又自觉同情，自亏不该施计让他上当受骗。而那许多坚定的“文革派”囚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亲眼目睹“无产阶级铁拳”是不分造反与否的，“文革”对他们来说，实是上当受骗，“卸磨杀驴”，也是一场灭顶的灾难，从此他们与我们在不同的政治思想背景下逐步由差异到融洽，化分歧为共识。在302牢房内，绝大多数犯人之间讲义气、同患难，互相包庇，私下、公开什么都敢谈、几乎共识到“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文革”不停，国无宁日。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 hwx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